责编：王翠娟　E-mail:wangcuijuan2008@126.com　Tel:010—62806237

◆书　摘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　蒙

编者按：近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王蒙：八十自述》，为作者在年届八旬之时回顾过往、平心静气写就的人生回忆与感悟。现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

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于是我在 1956 年 4 月，在我 21 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5 月份我寄去了稿子，6 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 9 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得意洋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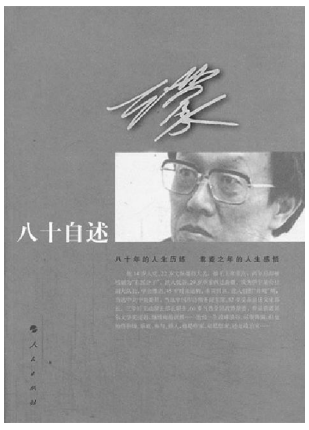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也算一夜成名。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文汇报》要求自次年即 1957 年 1 月 1 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

1957 年 2 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子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子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子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子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实。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

◆读书方法

康熙的读书之道

□李杰伟

康熙 8 岁登基，16 岁亲政，在位 61 年间，稳定内政，繁荣经济、维护国家统一，开创“康乾盛世”，人称“千古一帝”。成就他辉煌帝业的因素很多，其中，刻苦的学习精神和良好的读书方法对他治国理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他晚年总结执政经验时所说：“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

领导者读书是为了治国，治国必须读书。领导者必须克服将工作与读书对立起来的事务主义倾向，工作繁忙不是不读书的借口。越是政务繁忙，越要高度重视读书学习。康熙在处理繁杂政务的同时，坚持“学贵有恒”“万机之暇犹手不释卷”。在他看来，“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机，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以岂能尽乎！”因为领导的位置越高，面对突发事件和应急决策的几率越大，就越需要宽广的思想视野、丰富的实践阅历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旦领导者忙于事务而疏于知识的获取，就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视野狭隘，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康熙认为，读书的重要意义在于“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闻见之不广”。特别是当领导没有时间亲自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时，必须通过博览群书以开拓视野和解放思想。所谓工作太忙而无暇读书的借口，不仅在思想态度上没有正确认识读书的重要性，而且在工作方法上往往沉浸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而不能自拔。

读书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康熙认为，“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时常看书，知古人事，靡可寡过”。历史经验往往能够帮助领导者未雨绸缪，增强对突发事件的预见性，提前做好相关准备以防不测。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五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六月己丑日，康熙谕大学士等：“昔言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去岁（壬辰年）幸而未涝。观近日雨势连绵，山水骤发亦未可定。”事隔一天，康熙再次提起此事：“朕记太祖皇帝时，壬辰年涝；世祖皇帝癸巳年大涝，京城内房屋倾颓。明成化时，癸巳年涝，城内水满，民皆避居于长安门前后。”细读以上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康熙连续两天提醒臣僚要防范北京内涝的可能性，绝非心血来潮。从 1473 年（明成化九年）到 1713 年，京城数次内涝灾害的历史教训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之说是以比较丰富的历史依据为基础的。根据北京社科院尹钧科先生的考证，整个清代历史中，壬辰年和癸巳年北京大涝的几率“八九不离十”。清代之后，1952 年（壬辰年）北京先旱后涝，数十万亩农田因涝受灾。1953 年（癸巳年）北京地区因涝受灾面积达上百万亩。倘若再反思 2012 年（壬辰年）北京“7 · 21”大雨的教训，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壬辰、癸巳年重视北京的水患防范工作是有道理的。这个例子启示我们，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只有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才能高瞻远瞩，深谋远虑，造福一方。

读书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只有将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具体性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康熙意识到：“世之读书者，生乎百世之后，而欲知百世之前；处乎一室之间，而欲悉乎天下之理，非书曷以致之？”但是，“道理之载于典籍者，一定而有限；而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世之苦读书者，往往遇事有执泥处；而经历事故多者，又每逐事圆融而无定见。此皆一偏之见。朕则谓：当读书时，须要体认世务；而应事时，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这就是说，领导者读书必须有一种批判意识，因为治国理政是从当前的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实践中的问题往往是新的，在典籍中没有现成答案。书中的道理都有一定的前提和界限。一旦超出这个前提和界限，真理就变成了谬误。因此，领导者读书既要随时体察书中的道理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又要在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注意总结归纳经验，丰富自身的理论储备。以“知”来指导“行”，用“行”来检验“知”，知行并重，才能学以致用，运用自如，有所增益。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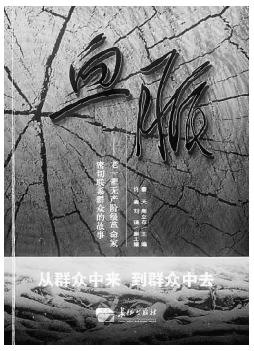


书名：《世界热议中国：寻找共同繁荣之路》

作者：郑必坚　基辛格等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11 月

作者谈书：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文集的总题目准确表达了文集的主旨和内涵。无论哪个国家、哪种政治力量，如果不能看到世界范围大变动、新觉醒的趋势，不能把握大局、顺应大势，不能摆脱旧思维、旧模式的迷思和束缚，就有可能犯重大战略错误，在 21 世纪的全球力量重构中丧失机遇。而认识和把握这种趋势，本身就需要新的觉醒。有了新的觉醒，才有可能在愈益广大范围内逐步构建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汇合点，逐步形成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以至持久稳定的命运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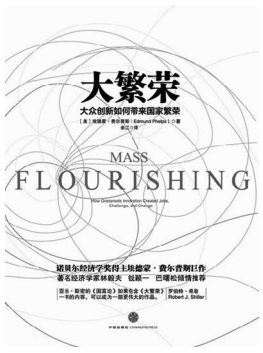
书名：《血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密切联系群众的故事》

作者：秦天　周立存/主编

出版：长征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

推荐人：吴杰明　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

推荐语：本书是一部立意鲜明、质量很高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普及读物。它的最大特点，或者说最大亮点，就是以历史的视野，深入发掘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的优良传统，用老一辈革命家躬身践行群众路线的感人事迹来解读和诠释这种传统，让优良传统展现思想、启迪现实、震撼人心。尤其是在当前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作者的这种努力就显得更加非同寻常和具有重要意义。



书名：《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作者：[美]埃德蒙·费尔普斯/著　余江/译

出版：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9 月

推荐人：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推荐语：虽然这本书讲述的是西方经济发展历史，但它对今天的中国读者很有现实意义。经过 3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创新是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从上而下的推动，还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进程？我们更容易相信是前者，而这本书呈现的历史却是后者。这是一本改变我们思维的书。



书名：《科学与人文：双赢与融合》

作者：曹莉/主编

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编者谈书：梅贻琦先生曾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思想，要求学生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因为这三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仅用 20 多年时间就跨越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一跃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与此同时，教育理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受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潮的影响，目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重专业、轻素质的倾向，特别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脱离的倾向尤为严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理应成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理念。

◆治学方法

费孝通的强国富民治学精神

□王道勇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有关费孝通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费孝通本人有《师承 读书 治学》一书专作介绍，费孝通的弟子也先后发表过不少个人的感想和解读。只是这两年讲的人少了。以史为镜，可正衣冠。在当今这个阅读日益表面化、著述日益短平快的时代，再次旧话重提，借此引起我们这些后来的读书人和治学者进行一些反思。

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身上都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即读书治学绝非仅仅陶冶情操、自娱自乐，而是为国为民。结合费孝通和他身边亲人、学生的回忆和记录，可以看到，费孝通用一生完美地诠释了“强国富民”这一治学精神。

与鲁迅先生一样，费孝通原来上的是医学预科，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严酷现实使他意识到：“学好医学只能治一人之病，学好社会学才能治万人之病，治社会之病。”为此，费孝通改学社会学，希望借此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梦。也正是基于强国这个理想，费孝通和其他同时代的中国精英一样，心怀报国为民大志去“向西方寻求真理”。解放前的 1948 年，因触怒国民政府正在英国避难的费孝通接到伦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任教邀请，但他不为所动毅然回国。在 1952 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和 1957 年被打成“五大右派”之一以后，费孝通当泥瓦匠、做过炊事员，但他从来没有对新中国、对学术丧失信心，仍然坚持研究民族问题和学术译介，如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统稿完成了《世界史纲》这部巨著的编译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年逾七旬的他更是争分夺秒全力忘我工作。正是由于心怀报国之志，费孝通的言行与论著并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他身上强烈地体现了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经世致用精神。

与强国相并存，富民也是费孝通读书和治学的直接目标。在 1990 年费孝通的 80 岁生日宴会上，有人问他一生中干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是志在富民。他以诗明志：“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解放以前，他关心旧社会乡村工业发展问题，写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等名著，是志在富民，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解放后，他关心民生，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调查研究，提出苏南模式和其他区域发展模式，也是志在富民；晚年他希望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让富民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更是在精神层面实现富民目标的集中体现。

为了实现强国富民这一治学精神，经过他自己、学生和其他后辈学者共同的总结，费孝通形成了一整套的读书治学方法，这就是至今仍然为读书人所津津乐道的治学“四勤”法。

一是脚勤。脚勤这个词就是他从英文 jogging 创译而来，他于 1982 年写《脚勤》一文。他说：“无论搞自然科学的，还是搞社会科学的，都要深入实际，这样，才能使理论真正对社会有用！”事实上，他终身践行这一理念。解放前的 1935 年夏，刚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即将留英学习的费孝通，就与新婚爱人王同惠结伴赴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考察。当时国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还非常罕见，后来的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和玛格丽特 · 米德等人当时也刚刚在南太平洋群岛等地进行各自的田野工作。但不幸的是，费孝通在山中误踏陷阱，新婚刚 100 多天的夫人王同惠女士在求援的路上遇难。而改革开放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费孝通 20 多年间每年有 1/3 时间均在途中，在当时交通条件还不发达的背景下，费孝通三访温州、三访民权、四访贵州、五上瑶山、六访河南、七访山东、八访甘肃，27 次回访江村。2001 年，已经 91 岁的费孝通身患哮喘病，身体明显发胖行动不便，但他的足迹依然遍及上海、常州、深圳、沈阳、成都、兰州等十几个省市，历时 180 多天，让后来的人们为他的治学精神击节赞叹的同时，也都自叹弗如。

二是脑勤。行为因，论为果。费孝通一生脚勤所得回报极为丰厚，脚上的功夫都集中在脑中得到了汇集和升华。按费孝通自己的总结，他一生走过的路可以表达为：“江村经济—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同时，他一生的思想路径也可以表达为：“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行动与思想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他后来提出的乡村工业发展、差序格局、小城镇理论、文化自觉思想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法，是在汽车上、在马路边、在农户家中酝酿和逐步成形的，都是来自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思想结晶。他后来总结提炼的苏南模式，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提法，更是在理论界、政府和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是手勤。费孝通在《简述我一生的写作》一文里说：“我这一生一直在写文章。”此言非虚，费孝通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洋洋洒洒 550 万字的 15 卷文集，却蔚为壮观，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和学问。他的名著《江村经济》资料即收集于在家乡养伤期间，解放前他写就出版了 100 多万字的论著。可谓是，文思泉涌，滔滔大观，不可遏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间，费孝通“狂来笔力如牛弩”，写成了 300 多万字的文章。按费孝通的说法，他是“走一趟，写一篇”，每年冬季是他集中写作的时间，脚勤的他开始稍放慢脚步，把脑勤的成果通过双手呈现出来，他总结脚勤的心得，提出新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除了学术著作，费孝通业余还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散文、随笔和诗歌。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谈到费孝通文章时，曾盛赞其“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

四是嘴勤。费孝通认为，“文为心声，读其文，闻其声而识其人矣”。在手勤的基础上，费孝通还勤于也勇于直接向国家、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表达，希望借此直接实现强国富民的治学目标。1957 年，费孝通写就了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较早地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提出了抗议，并因此恶运缠身 23 年，直至 1980 年，但他对此毫无怨言。改革开放以来，他成为一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更是借此平台为国为民大声疾呼，向国家建言献策。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上出过大力，他全力促成了小城镇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国推行，他建议农民工可以“离土不离乡”，他强调国家要重视边区开发，他全力支持浦东开发，等等。譬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主张把“三大差别”和农民一起“消灭”在小城镇里，提出了苏南模式，直接影响了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地区发展模式的兴起；在 1990 年他又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后来又更具体地提出了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宏观设想，与现在我们所说的长三角城市带、新丝绸之路等发展战略的出台都有直接的关联。值得一提的是，费孝通特别强调，小城镇建设，一定要加强引导、合理布局，否则可能无法解决人口过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病症。

费孝通一生的治学之路，可以用艾蕾斯在其《我的一生》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凡是我双脚踏过的地方盛开着芬芳的玫瑰。”2005 年费孝通先生逝世后，曾有学术史研究者说：“费孝通的逝世，标志着 20 世纪完整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又完整受过英美教育的知识分子的时代结束了。”甚至有人哀叹说，过去那个时代的学者是“学贯中西”的，而后来的治学者国学功底不行，西学也没吃透，是“不吃东西”的半吊子文人。其实不用如此悲观。事实上，费孝通也曾多次在文中哀叹自己的国学功底远逊于老师潘光旦、吴文藻等人。时代的发展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东西的流逝虽然可叹可惜，但只要我们能够继承那些在前代治学者血液中流淌着的文化基因，继承并宏扬费孝通“强国富民”的治学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声称：学术不死，中国读书人的本性依然在传承。